

大風

康有為與戊戌變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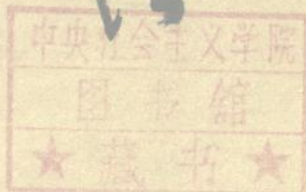
千劫皆煩惱吾

來仍現身獄囚

哀濁世飢溺為

斯人諸聖皆良

湯志鈞著



B2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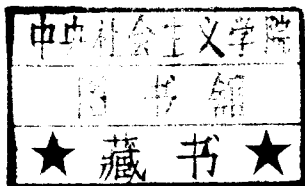
69317

康有为与戊戌变法

汤志钧 著



200222589



中 华 书 局

1984年·北京

康有为与戊戌变法

汤志钧 著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中华书局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1/32·11 1/4印张·2插页·253千字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5,000册

统一书号: 11018·1227 定价: 2.25元



康有为像



1902年所撰《论语注》手稿



1902年所撰《孟子微》手稿



《大同书》手稿记政
变游历加拿大见闻



1902年《政
见书》手稿
封面



前 言

本书是我研究康有为和戊戌变法部分论文的结集，共计二十三篇。

五十年代，我曾出过两本戊戌变法论文集。后来，又在报刊上陆续发表这方面的论文。“十年动乱”，曾将已刊、未刊诸作，私下清理。由于很多论文是在札记的基础上写出的，为了行文方便，札记又是用文言文写的，这样，论文和札记就成为两种类型。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二年間，我用“新探”和“旧札”分别汇总，写有简短“弁言”：

“余治戊戌变法有年，偶有所得，辄行札录，日久自成篇帙。一九五三年始稍稍露布，嗣出《戊戌变法史论》（一九五五年）、《戊戌变法史论丛》（一九五七年）、《戊戌变法简史》（一九六〇年）、《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一九六一年），问世匆遽，意多不称。报刊已发诸章，既待删革；笥篋未是之草，亦俟董理。悔畴昔之梨枣过促，感今兹之修缮维艰。越廿余年晨昏，积百万言芜稿。爰将论旨赅确，言之成理者曰新探；资料丛胜，持之有故者曰旧札。非敢厕作者之林，亦欲以爬梳剔括，示后人以方便耳。”

当时不想出版，也不能出版，以致“旧札”可以推演为“新探”的既悉仍其“旧”；续有所得，也还是写成札记。这样，“旧札”越积越多，而“新探”却不敢问津。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粉碎，科学的春天来到了。我也贾起余

DF100/21

勇，整理“芜稿”，陆续刊发。本书就是从这些论文中选录出来的；也有一些是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五年间在杂志上登载过的；至于过去辑入《戊戌变法史论丛》的，则概未收入。

本书所辑，约分五组：

一是关于康有为生平和思想的论述。认为康有为是向西方学习的先进的中国人。他学习西方，又借用儒家学说；受到廖平启示，又和传统的今文经学不同；对封建卫道者的借孔子以维护封建秩序极为不满，又想依援孔子儒经，实行他的维新大业。反映了一开始走上政治舞台的中国资产阶级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演成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

二是关于康有为大同思想和《大同书》的估价。认为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孕育较早，而《大同书》的撰述却迟。《大同书》是康有为在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二年避居印度时所撰，它不是导向“无有阶级”的公产社会，而是导向资本主义社会。评价《大同书》，除通过本身内容的分析外，还得结合他撰书时的政治实践。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也在戊戌变法前后有着显著差异，它的不同，又是和政治实践息息相关。

三是对上海强学会、《时务报》、湖南南学会的探索。上海、湖南是维新运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上海强学会、《时务报》、湖南南学会也是影响较大的报刊和学会。我认为《时务报》的宣传鼓动，梁启超功不可没；但它始终受到张之洞的操纵。所谓梁启超、汪康年“主笔”、“经理”之事，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洋务派之争；是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争。结果以改良派的失败而告终。认为南学会也没有“实兼地方议院之规模”。此外，对戊戌时期上海的出版界也试作探究。

四是对戊戌变法研究中一些争论问题，如历史意义和作用、运

动的性质、光绪皇帝的评价、唐才常和自立军等，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五是关于史料搜辑、校勘、考订方面的文章。

论文中少数几篇因发表有先后，内容有重查，作了一些调整，如《康有为早期的大同思想》中关于康有为和今文经学的关系，在《康有为和今文经学》中已经论到，这里把它删节了；《论〈大同书〉的成书年代》，则是就《论康有为的〈大同书〉》和《再论康有为的〈大同书〉》两文重新撰写的。其余各篇，除核对引文、增损例证外，很少修润，主要论点也未改动。

康有为是起过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戊戌变法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涉及的范围很广，有待探索的课题很多，本书只是论述其中几个方面。今后还想不断研讨，扩展领域，以就正于读者。

汤志钧 一九八二年五月

目 录

前言

试论康有为	(1)
重论康有为与今古文问题	(19)
康有为和今文经学	(35)
试论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	(50)
戊戌维新与孔子改制	(64)
论康有为和保皇会	(80)
 康有为早期的大同思想	(96)
论《大同书》的成书年代	(108)
《大同书》手稿及其成书年代	(125)
论康有为《大同书》的思想实质	(134)
论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	(153)
 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	(172)
论《时务报》的汪梁之争	(190)
论洋务派对《时务报》的操纵	(205)
论南学会	(217)
戊戌变法时期上海的出版界	(232)

关于戊戌变法的评价问题	(243)
戊戌变法与改良主义	(250)
关于光绪皇帝的评价问题	(260)
戊戌政变以后的唐才常和自立军	(271)
《汪穉卿师友手札》中关于强学会的史料	(285)
《仁学》版本探源	(301)
人物评价和史料鉴别	(329)
附录: 戊戌变法研究述评(一九八〇年)	(335)
后记	(347)

试论康有为

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年)是在近代中国起过进步作用的历史人物,也是后来走向反面的代表人物。贯穿他的政治思想凝滞不前的,主要是改良主义。它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革命高潮未曾掀起以前,反映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有其重要贡献;但等到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迅速开展,他的思想仍旧停留在原位上,就成为历史的障碍,并且一天天地沉沦堕落下去。本文旨在综述康有为的一生,并探讨他政治思想的实质。

—

康有为,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生长在遭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和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最早的地区。祖赞修,官连州训导;父达初,江西补用知县。他的青年时代,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代:是中国农民革命经历了太平天国革命,仍然掀起不断的革命斗争,冲击着封建统治的时代,是中国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开始投资于新式工业,而在其初步发展的过程中,遭受到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尽力摧残的时代。在这危急的时代里,康有为逐渐形成了一种改变中国现状的思想。

形成康有为这种思想的主要来源有二: 其一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 其二是中国传统的儒家

学说。

康有为幼年受的是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十九岁时,从朱次琦受“济人经世”之学,以为“圣贤为必可期”,“天下为必可为”^①。旋“以日埋古纸堆中,汨其灵明,渐厌之,日有新思,思考据家著书满家,究复何用?因弃之,而私心好求安生立命之所”,于是“闭户谢友朋,静坐养心”,“自以为圣人则欣然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②。国家的危亡,现实的刺激,使他对传统的文化学术发生怀疑。二十二岁时,他和在北京任职的张鼎华(延秋)相晤,接触到一些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影响和当时正在酝酿着的改良主义思潮,从而“尽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既念民生艰难,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③。接着,“薄游香港”,亲眼看到英国侵略者所建立的殖民地秩序,开始感到资本主义制度比起封建制度要优越。从此,他开始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历程。

在康有为的《自编年谱》中,曾有关于涉猎“西书”和向往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记载:

光绪五年己卯(一八七九年)二十二岁:“既而得《西国近事汇编》,李□《环游地球新录》及西书数种览之。薄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瓌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乃复阅《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

光绪八年壬午(一八八二年)二十五岁:“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

① 《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年丙子,十九岁。”

② 《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四年戊寅,二十一岁。”

③ 《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五年己卯,二十二岁。”

十一月还家，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

光绪九年癸未（一八八三年）二十六岁：“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于时欲辑《万国文献通考》，并及乐律、韵学、地图学，是时绝意试事，专精问学，新识深思，妙语精理，俛读仰思，日新大进。”

经过几年的摸索，他以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很可以救中国。“要救中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他学了这些东西以后，就企图按照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模型来改变中国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

另一方面，康有为又在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中汲取力量。康有为的祖父赞修原治程、朱理学；他自己曾“静坐养心”，“私心好求安心立命之所”，受到陆、王心学的影响。后“由阳明学以入佛学”，二十二岁时，入西樵山，居白云洞，“专讲道、佛之书，养神明，弃渣滓”。但是，“偶有遁逃聊学佛”的结果，仍然“忧患百经未闻道”^①。陆、王心学，佛教哲学，没有使他找到出路。从而在受到张鼎华的影响，以及“涉历西书”，“薄游香港”后，向西方寻找真理。这时，正值中法战争，康有为鉴于“马江败后，国势日蹙”，而趁一八八八年入京应试的机会，第一次向清朝光绪皇帝上书，请求改良政治以挽救国家的危亡，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政治主张。但这次上书为顽固派所阻，光绪皇帝没有看到，康有为且备受顽固守旧分子的嘲笑和攻击。这促使他认识到找寻新的思想武器的必要。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封建顽固势力在政治上、学术上都占统治地位，要找寻新的思想武器，除“向西方学习”外，还需从中国传统的封建学说中去探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耸上者之

① 康有为《康南海诗集·澹如楼读书》。

听”，才能“鸣共友声”，才能实现他的“变法图强”的政治目的。当康有为第一次上书不达，返粤移居时，晤见了今文经学家廖平。今文经学是讲究“通经致用”、“微言大义”的，康有为受其启示，觉察到陆、王心学虽“直捷明达，活泼有用”^①，但不及今文经学的“灵活”；佛教哲学虽讲“慈悲普度”，但“与其布施于将来，不如布施于现在”^②。这样，便想从今文经学中汲取可资运用的东西进以议政，“复事经说，发古文经之伪，明今学之正”^③。将今文“三统”说阐发为“改制”、“因革”的理论，将今文“三世”说推演为“据乱世”、“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的系统，“愈改而愈进也”，只有变法，才能使中国富强，才能达到“大同”的境界。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中国儒家今文学说，是康有为政治思想形成的两个主要来源。一八八九年在一八九五年，他表面上宣称不谈政治，实际上从事于变法运动理论体系的建立，把改良主义思想同儒家学说作重新解释。他除整理出版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两本讲学记录外，又在他的弟子梁启超、陈千秋等的协助下，刊行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诸书。

《新学伪经考》大旨谓：东汉以来的经学，多出刘歆伪造，“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所以叫做“伪经”；刘歆“饰经佐篡，身为新臣”，是新莽一朝之学，与孔子无涉，所以叫做“新学”。“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贾、马、许、郑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④

① 梁启超：《康有为传》第三章《修养时代及讲学时代》。

② 同上。

③ 《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十四年，三十一岁。”

④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序目》，见拙编《康有为政论集》第九二——九三页，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二月版，下简称《政论集》。

“汉学”(古文经学派)和“宋学”是当时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两大学派,而康有为却愤激地指斥古文经学不过是“新学”,不是孔子的“真传”;古文学者所尊崇的经书只是“伪经”,不是“真经”;“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这种“逆乎常纬”^①的反抗,予“汉学”、“宋学”以根本的打击,予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传统思想以大胆的冲荡,它在学术意义上是推翻“古文经学”的“述而不作”,在政治意义上是打击顽固派的“恪守祖训”,为扫除变法维新的绊脚石准备了理论条件。

《孔子改制考》则以为孔子以前的历史,是孔子为救世改制的目的而假托的宣传作品,都是茫昧无稽,中国历史,从秦、汉以来才可考信。他说:周末诸子百家纷纷起来创立教义,企图凭自己的理想来建立自己认为最好的社会制度,并把自己所建立的制度托为古代所曾实施,借以争取人们的信仰,这是因为人之常情,“荣古而虐今,贱近而贵远”的缘故。如老子假托黄帝,墨子假托夏禹,许行假托神农都是。孔子创立儒教,提出一套他自己创造的尧、舜、文、武的政教礼法,作六经以为“托古改制”的根据。经过诸子争教,儒墨“显学”,从战国历秦到汉,孔子成为全国教主。他打通了《春秋公羊传》、《王制》、《礼运》、《论语》以及其他各经各子,尊孔子为教主,用孔教名义,提出变法维新的主张,把孔子装扮成为“托古改制”者,成为变法改制的张本。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两本最重要的著作,它不是一般的“考辨专著”,而是冲击封建势力提出改制变法的理论著作。它是披着经学外衣,把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措施,挂上孔圣人的招牌,拿孔子来对抗孔子,以减轻非圣无法的压

① 康有为:《长兴学记》第一一二叶,光绪十七年万木草堂刊本,见《政论集》第八九页。